

校园文化与现代文学

“学衡派”与20年代的国学研究

高恒文

“昌明国粹”，这是“学衡派”的重要思想宗旨之一。本文以此为中心，叙述“学衡派”与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和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的关系；前者关系到“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后者则关系到它在东南大学的学术处境。

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来深入认识和理解“学衡派”：不仅可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其思想主张的由来，而且由此考察其思想主张与其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然内容比较完整，主题也比较明确，但是由于是由作者《“学衡派”与东南大学》一书中的一个章节的部分内容删节而成的，因而有些地方可能显得疏略。

(一)

《学衡》是这样阐述其“昌明国粹”的思想宗旨的：

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

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

这里出现了“国粹”和“国学”这两个意义根本不同的概念。比较而言，“国学”是一个学术概念，本身没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而“国粹”则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肯定意义的价值判断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粹”一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成为一个贬义词，是批判的对象，因此，“学衡派”提出这种“昌明国粹”的口号，并且申明“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以及“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云云，则明显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的思想潮流而言的；也就是说，“学衡派”的根本目的其实完全是从学术研究的意义上来提出对于“国学”的研究的。更进一步地说，“学衡派”的三个主要人物——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对于“国学”并无深入的研究，“国学”根本不是他们的专业，并且也看不出他们有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术打算与选择，如果不是有“柳门”——柳诒征及其弟子——的集体加入，恐怕是不敢说“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而后来学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这样的大话的。虽然几乎所有的社团、流派都是打出大旗、树立远大目标以期引起世人注意，这也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但对“学衡派”来说，打出“昌明国粹”的旗号，目的恐怕主要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一种文化态度、一种思想立场，是有其针对性的，针对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的思想潮流。

为了明确这一点，不妨再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看“学衡派”的这种思想的一个直接历史来源。

1919年1月，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时，北京大学教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成立了“国故社”，创办了《国故》月刊，自云其宗旨为“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而

其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则是“慨然于国学沦夷，发起学报，以图挽救”。虽然这个“国故社”和“学衡派”在学术与思想上均大有区别，但两者“昌明国粹”的意图却是十分相似的。《国故》刚一出现，就受到同时成立的、由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组织的“新潮社”的批评。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说：“近年研究国故的人，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他们的研究国故，就是‘抱残守缺’。”傅斯年在毛子水的文章后面特意加上一段“附识”，指出“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由此而引发了学术界、文化界的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讨论。

《新潮》不久发表了胡适答毛子水的信，提出“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肯定了毛子水、傅斯年的基本观点，并且进而指出：“清朝的‘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的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与此同时，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题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文章，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这一角度来讨论“整理国故”的问题。由此亦不难看出，“整理国故”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思想运动再发展到学术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

“整理国故”的最初的学术成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古代小说的考证和“疑古”思潮的出现。两者都与胡适有密切的关系：胡适对《水浒传》、《红楼梦》的考证取得很大成就；他积极支持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及其研究。1921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由胡适主编的“北大日刊国学号”。1923年1月，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出版——当然，该刊创刊时《学衡》已经创刊1年了。

——这就是“学衡派”提出的“昌明国粹”口号的最直接的学术背景。

《学衡》一创刊，就对“整理国故”提出了批评。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批评“所谓‘新文化’领袖人物”云：

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异义，以期出奇制胜。且谓不通西学者，不足与言“整理国学”，又谓“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而彼等乃独怀为学秘术，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风头”；即有疏漏，亦无人敢与之争。则彼等所倾倒者，如高邮王氏之流，又岂曾谙西文、曾有入西洋大学乎？

这显然是针对“整理国故”的理论与方法而言的，因为“‘整理旧学’须用‘科学方法’”正是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基本思想，而“高邮王氏之流”恰恰是胡适推崇过的——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不是说过《水浒传》“很当得起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翻训诂的工夫”之类的话么？而且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清代讲训诂的方法，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两人，方才完备”。胡适的论点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但梅光迪的批评前提也有明显问题：“高邮王氏之流，又岂曾谙西文、曾有入西洋大学乎”固然是事实，但这并不等于不懂西学、不曾入西洋大学就一定是其治学方法不是“科学方法”，或者说一定不可能与“科学方法”有所暗合、相通之处的。

同时，吴宓在《学衡》上发表的《文学研究法》一文，虽然不是完全针对“整理国故”的，而是谈论“西洋文学之研究法”的，但文章开头所谓“吾自愧于国学未尝研究”；“窃疑以此法（按，即“西洋文学之研究法”）研究中国文学，必亦可

通”云云，已暗示此文的写作乃别有用意。“文学研究”和“国学研究”本来并不一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吴宓点出“国学”二字，说明他作文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胡适等人倡导并且实践的“整理国故”，所欲“整理”者，固不限于文学，但最初的学术成果是对《水浒传》等古代白话小说的考证，或者说，影响最大者在于此，所以，吴宓所谓“研究中国文学”，则是暗指胡适等人在“整理国故”的旗号下所做的考证古代白话小说的工作。这样说，并非臆测之词，因为下文吴宓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吾国学生热心研究西洋文学者甚多，然盲从一偏，殊多流弊”之说，可见吴宓作文，心中时时有他所批判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倡导者在焉。

既然“于国学未尝研究”，自然不好直接评论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于是吴宓此文由“西洋文学之研究法”谈起，并且谈的是“美国人研究文学之分派”，这样吴宓自然就有说话的资格了。在这篇文章中，吴宓将美国人的文学研究分为“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和“义理派”。其论“考据派”云：

总之，考据家之误，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要之，考据派之文人，极似吾国之小学家，谓其成绩与研究文学者，不无裨助，则可，然以此为研究文学之唯一正轨，则大谬也。

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固然不是“惟以训诂之法研究之”，但胡适既对“吾国之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十分推崇，又是大肆宣扬以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来考证古代白话小说的，所以，吴宓的这段话，显然是隐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的批评。吴宓认为，美国的文学研究中的“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这三派，“在吾国，因时势所趋，亦将有日盛之势”，这个判断，其中恐怕是包含了对胡适等人的古代小说考证正呈一时之学风批评吧？吴宓认为“考据家之误，

在以科学之法术，施之文章，而不知文章另有其研究之道也”，这是他之所以批评“考据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他于四派之中独许“义理派”的原因之所在。我们知道，吴宓早在1920年就发表了《红楼梦新谈》论文。这篇文章借助西方小说理论来评论《红楼梦》的思想与艺术，分“宗旨正大”、“范围宽广”、“结构谨严”、“事实繁多”、“情景逼真”和“人物生动”这样六个部分进行论述的。从文章的这六个小标题就不难看出，吴宓的这篇文章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的，而不是对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特征作客观的分析与说明。对照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胡适做的是对作品的事实判断，而吴宓做的是对作品的价值判断。既然胡适孜孜以求的是对作品的成书的历史过程的考证，或者如他稍后对《红楼梦》的研究只关注对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一样，确实如吴宓所批评的美国的“考据派”那样，“于文章惟以训诂之法研究之”，“而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辞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那么，吴宓的批评是自有其来历的。就此而言，吴宓胡适的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差别，恰恰是学术工作的不同方面，原本不是吴宓所认为的那样截然对立，又各有其意义之所在。并且，胡适对此是有明确的认识的，他在《论国故学》中说：“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⑪这种思想，显然是吴宓所不能认同的。

当然，“学衡派”对“整理国故”的学术思潮的批评，还表现在对“整理国故”学术思潮而来的“疑古”史学的更为直接批评。对此作者另有专门讨论，限于篇幅，兹从略。

(二)

就在“整理国故”学术思潮风行一时之际，东南大学的国文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下面，再看“学衡派”与近在身边的“国学研究会”的关系。

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是由国文系师生发起并组织的，正式成立于1922年10月13日。1923年开始发行《国学丛刊》，每年定期出版4期。“国学研究会”成立后，请校内外学者作学术讲演——称“讲习会”，从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每周一次，共进行了10次，并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1集。这10次讲演的情况如下：

时 间	讲演者	讲演的题目
1922年10月20日	吴 梅	词与曲之区别
1922年10月27日	顾 实	治小学之目的与其方法
1922年11月3日	梁启超	屈原之研究
1922年11月9日	陈仲英	近代诗学之趋势
1922年11月17日	江亢虎	欧洲战争与中国文化
1922年11月24日	陈钟凡	秦汉间之儒术与儒教
1922年12月1日	陈去病	论诗人应具有之本领
1922年12月7日	柳诒征	汉学与宋学
1922年12月24日	江亢虎	中国古哲学家之社会思想
1923年1月9日	梁启超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此外，还出版丛书，最先出版的是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和刘师培《疑义举例补》，并且还准备出版《左庵遗稿》（刘师

培)。也就是说，“国学研究会”和“学衡派”几乎同时成立；虽然会刊晚出一年，但学术活动远比“学衡派”有声势。^⑪

“国学研究会”和东南大学的其他学术团体一样，都是在老师指导下由学生组织的。虽然是由学生组织的，但主持其事的，实际上是指导老师——称“指导员”。“国学研究会”的“指导员”是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和柳诒征；除柳诒征是历史系教授外，另外四位均为国文系教授。其会刊《国学丛刊》，1923年出版的第1卷的全部4期，是由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轮流主编的，从1924年开始的第2卷，改为陈钟凡指导学生编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1923年4月，国文系计划成立“国学院”。这是由“国学研究会”发展而来的。只是“国学研究会”是由教师指导的学生组织，而“国学院”则是完全由教师主持的学术机构，其性质是这样规定的：“国文系学程修毕之后，特设国学院以资深造，为国立东南大学专攻高深学问之一部。”^⑫

《国学丛刊》的《发刊词》虽然是由个人（顾实）撰写的，但由通常之惯例而观之，当为该会集体意见之表述，故由此可稍窥该会之学术旨趣也。

首先，其《发刊词》开头即叙述学术背景与该会发起之动机云：

强邻当前而知宗国，童昏塞路而知圣学。语曰：“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洵乎犹足以有为也。昔者，隋唐之隆也，华化西被，方弘海涵地负之量；迨及逊清之季，外学内充，大有喧宾夺主之慨。曾几何时，事异势殊。自非陈叔宝太无心肝，谁不俯仰增慨？则海宇之内，血气心知之伦，咸莫不嚄然曰“国学”。与夫本会同入，近且出其平素之研究，而有《国学丛刊》之举行，岂有他哉？一言以蔽之曰：爱国也，好学也，人同此心而已矣。^⑬

“昔者，隋唐之隆也，华化西被，方弘海涵地负之量；迨及逊清之季，外学内充，大有喧宾夺主之慨”，因此而欲昌“国学”，自然是“爱国也”，而不仅仅是“好学也”，所以有“强邻当前而知宗国，董昏塞路而知圣学”这样的大前提。这显然和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的思想前提，大相异趣，而使人想起章太炎等人在晚清创办《国粹学报》的宗旨。

其次，《发刊词》所谓“括举纲领，藉便来者”之“国学”者，有此六类：小学类、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诗文类。这显然是由中国传统学术所谓的经、史、子、集的那种分类稍加变化而来的。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名目的分类问题，在它的背后其实是蕴含着某种特定的学术思想的原则。由此再对照同样是由顾实起草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所提出的所谓“以国故整理国故”的学术原则（详见下文），《发刊词》中对“国学”的这种理解与分类，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理论与出发点，就一目了然了。固然不能因此就断定其学术思想完全是中国传统的，但它与晚清“国粹派”一脉相传，而与新起的“整理国故”派判然有别，不是十分了然么？

这一点，由“国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的学术经历来看，可获资证。

顾实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受《国粹学报》影响很深，他在这篇《发刊词》的下文，论“小学”而有“董理先典，非此莫属；近世王俞，懋绩卓著”诸语，论“经学”，则有“先审文字，后明义理；今文古文，汉氏师承；近世考证，曲畅旁通；专精一经，再及其余”之说，可见其学术师承。

陈去病也曾留学日本，为同盟会成员，曾编辑《国粹学报》，并在该刊发表诗文。

陈钟凡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黄侃、刘师培的得意弟子；

刘师培去世后积极收集其遗文，不仅拟出《左庵遗稿》，作为“国学研究会”丛书，而且在《国学丛刊》上大量发表其遗文；又有《仪征刘先生行述》，其文意在“于其他行事不备书，书其学术之著者，与天下学人共悼之”，^⑭可谓深具弟子之苦心也。他于1921年辞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教职，南下任教于东南大学。

吴梅与陈去病友善，曾同为“南社”成员。1922年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南下任教于东南大学。吴梅是著名的戏曲专家，研究与创作均严守曲律，“从戏曲本身研究作曲、唱曲、谱曲、校曲。”^⑮曲之外，宗宋诗，得到陈三立的指点；词宗南宋，受近人朱祖谋影响很大。他辞北京大学教职而到东南大学任教，恐怕与北京大学“旧学”沦落而“新学”兴起，日益成为新文化、新文学、新学术的中心有关。在东南大学，他和学生组织词社，名为“潜社”，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每月一集，游览南京名胜，师生唱和，谱词度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刘师培、黄侃任“总编辑”的《国故》创刊时，吴梅是“特别编辑”之一，陈钟凡是“编辑”。陈钟凡1925年出版的《诸子通谊》，曾在该刊第一至第五期连载。

因此，就其主要成员的思想与学术而言，“国学研究会”远承晚清的《国粹学报》，近承1919年的《国故》，与新起的“整理国故”学术思潮，大相异趣。

下面，再就“国学研究会”与“整理国故”思潮的学术思想的区别，略举数端。

《发刊词》论当前学术之弊端，有“复有金壬，谓他人父，果赢速化，倡废汉字，甘作虎伥，抑何忍心，一切古书，拉杂摧烧”云云，这显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

还有，《国学丛刊》不仅发表学术论文，而且也发表旧体诗词，这是意味深长的，表明“国学研究会”不是将“国学”作

为对象化的研究对象——像“整理国故”的倡导者那样，当做已经成为历史陈迹来研究它，甚至是像“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表现的否定态度，或者如稍后由“整理国故”而发展到“疑古”——而是当做与自己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的文化遗产。

由署名“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直接提出对北京大学的“整理国故”派的批评：“今日学者之间，争言以科学理董国故”，然则“非国学湛深之士，而贸然轻言以科学理董国故，所不致为汉博士之续者几稀，非郢书燕说，贻讥方闻，则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而已”。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批评的对象显然是一目了然的。并且，针对“整理国故”派的科学方法，而提出“以国故理董国故”理论：“以国故理董国故者，明澈过去之中国人，为古服华装，或血统纯粹之中国人者也。而以科学理董国故者，造成现在及未来之中国人，为变服西装，或华洋合婚之中国人也。”^{①6}

回到对“学衡派”的讨论这个问题上来，从以上叙述的情况来看，“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在学术思想乃至文化思想上，似乎是有相当的一致或相近之处的。

但是，事实上“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虽然同在一个校园，却不相往来。

柳诒征是“学衡派”中对国学最有研究。他曾是“国学研究会”的“指导员”，并且参加了该会最初举行的“讲习会”的讲演。但是，后来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时，柳诒征的讲演却没有被收入。并且，《国学丛刊》最初由“指导员”编辑，陈钟凡、顾实、吴梅、陈去病四人都轮流主编了，柳诒征却没有主编过一期。还有，柳诒征也没有在《国学丛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恐怕不是偶然的原因。柳诒征是历史系和地学系师生组织的“史地研究会”的“指导员”，该会

也有刊物——《史地学报》，这恐怕不是柳诒征不再介入“国学研究会”的主要原因。“学衡派”的其他成员，对国学没有什么研究，自然没有参加“国学研究会”的活动。“学衡派”既然倡导“昌明国故”，那么，就常情而言，理应吸收近在身边的“国学研究会”的成员加入自己的队伍，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再从“学衡派”的《学衡》和“国学研究会”的《国学丛刊》来看，双方的成员均没有在对方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

这样看来，“学衡派”与“国学研究会”，可能存在某种分歧。陈钟凡是“国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也是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据他在1949年以后的“自传”中说，他是反对“学衡派”的。^①虽然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原因之所在，并且这种说法可能也有1949年以后“学衡派”的政治遭遇的原因，但至少可以证实上文所叙述的事实。

原因可能与“学衡派”对国学研究的批评有关。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几乎没有专文批评当时的国学研究，无论是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整理国故”一派，还是对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一派，并且梅光迪、吴宓的文章中涉及到的对国学研究的批评，都是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而来的，如上文所述，明显是针对“整理国故”的。倒是1923年以后，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这一南一北的两派的国学研究在学术界正式登场亮相后，《学衡》杂志上才发表外地来稿，对这种新起的学术潮流提出专门的批评——这就是1923年《学衡》先后发表张荫麟、孙德谦的文章。张荫麟的文章是对由“整理国故”发展而来的“疑古”学术思潮的批评，而孙德谦则是对南北国学研究的全盘批评。下面，且看孙德谦的批评。

孙德谦（1859～1935年），字受之，一字寿芝，晚号隘堪居士。早年喜高邮王氏之学，后病其琐碎支离，而治章学诚《文史通义》，进而全力治先秦诸子之学，晚清著名学者，著有《诸

子通考》。于文专事骈偶，与李详（审言）并称“李孙”，有《四益宦文稿》二卷、《六朝丽指》一卷。平生笃志儒学，1912年沈曾植等创办“孔教会”，发起征文，以《孔教大一统论》应征。吴宓曾专程到上海登门拜访，为《学衡》组稿，十分钦佩其思想与学问。

孙德谦在《学衡》上发表的《评今之治国学者》一文，并不是专门针对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的。例如文章中说：“彼以汉学家言，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则考据之学是也。虽然，言乎考据，何得即称为国学乎？”“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这显然是针对胡适等人的“整理国故”而言的。但是，也有对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的批评：

曲始于元，其时张小山辈，特造为新声，以补词之不足耳。顾以其可被诸管弦，旧目为游戏之具，近虽有识其渊源、较其音律者，然不加考索，善于歌唱，滥吹其中，此类为多，亦以此本游戏之事，非关学问也。乃明知其为游戏，偏欲夸大其事，谓曲者国粹之所存，夫国粹固若是其小乎？^⑩

这至少是包括了对“国学研究会”重要成员吴梅的批评。孙德谦在文章中还说，“吾谓今之治国学者，曰好古，曰风雅，曰游戏，如斯而已矣”，则是对“今之治国学者”，不问南、北，全部予以否定，这也显然是包括了对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会”的批评。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孙德谦曾经致信《国学丛刊》，对陈钟凡的诸子研究提出批评；《国学丛刊》发表了孙德谦的批评信和陈钟凡的答复，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反复辩难。^⑪虽然两人各持己见，但还算是一般的学术讨论。然而，孙德谦一边在《国学丛刊》不断发表批评陈钟凡学术观点的信函，一边又在《学衡》上发表《评今之治国学者》这样全盘否定国

学研究的批评文章，显然是加强了给人以他的《评今之治国学者》似乎是专门批评陈钟凡等人的国学研究这样一种印象。

我认为，《学衡》发表孙德谦的这样一篇批评文章，可能也是影响了“学衡派”和“国学研究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学衡派”对梁启超的批评，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12月，《学衡》发表的汤用彤的《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中，明确提出了对梁启超的指名道姓的批评：

梁任公，今日学者巨子，然其言曰：“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原注：中略）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遂席卷天下，把高的理想又丢掉了。”此种论调，或以科学全出实用，或以科学理想低下，实混工程机械与理想科学为一，俱未探源立说。^{②0}

汤用彤这篇文章发表时，正值梁启超应邀在东南大学讲学，并且为“国学研究会”举行的学术讲演作专题学术讲演，那么，汤用彤这样指名道姓的批评，不仅让梁启超很难堪，而且也让“国学研究会”很难堪。而且，柳诒征1921年在《史地学报》上发表的《论近人治诸子学之失》一文中，也对梁启超等人“诋毁孔子、崇拜墨子，及九流不出于王官等议论”提出了批评。^{②1}

从学术系统来看，梁启超和“国学研究会”诸人，明显是不尽相同，但梁启超作为学界巨子，倒也颇受“国学研究会”的推崇。“国学研究会”举行的学术讲演，由梁启超作第一讲和最后一讲，后来编辑、出版《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也是以梁启超的两篇讲演稿作为开头，这些都显然有借重梁启超的学术地位和名望的意义。再者，陈钟凡在回答孙德谦的批评时曾云：“述此书竟，接读近期《东方杂志》载梁启超君《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亦复助我张目，益信鄙说实斯世之公论，彼固执

己见者无当大雅也。”梁启超“亦复助我张目”是一回事，能否因此而证明“鄙说实斯世之公论”则又是一回事，这个道理陈钟凡至少在理论上不会不明白，但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借梁启超来替自己张目呢？更意味深长的是，陈钟凡在下文还这样说道：“梁君亦笃信今文者也，其言如是，其斥仲舒也如是；谓‘仲舒之不可轻訾’，不亦可笑之甚邪？”⁴²

当然，“学衡派”是一个以文化批评著名的社团，而“国学研究会”则是一个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术团体，虽然两者在文化思想上存在着某种相近的观点，但毕竟在学风和学术经历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别——至少“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这三个留学出身的年轻学者，专事批评而无多少实绩，留学西方而无甚国学根柢，这在“国学研究会”的陈钟凡、顾实、陈去病、吴梅等专治国学出身的学者的眼里，恐怕有些不大以为然。这样，再加上上述原因，它们之间的距离自然也就愈来愈远了。

对于“学衡派”来说，没有能够团结近在身边的“国学研究会”这些在学术上很有实力与影响的学者，显然是一个很重大的失误与损失，使得自己在队伍的整体实力上更不足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学术思潮相抗衡；又因为在学术上没有能够作出实绩来支撑其理论、观点，因而容易使其理论、观点流于空洞的批评，这自然又影响了其社会效果。“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成功，靠的并不仅仅是其理论、主张；如果没有学术上的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能够产生那样迅速而重大的影响么？

“学衡派”的主要成员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人对“整理国故”的反应，十分无力，甚至连一篇专门的论文都没有，既不能在理论上作出批评，又不能对其具体的学术成果提出评论，暴露出其自身最为严重的学术实力薄弱的弱点。

-
- 注 《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国故》第1期，1919年3月。
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
- ⑩ 载《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
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2月。
载《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载《科学》第4卷第2、3期，1919年2、3月。
载《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载《民心周报》第1卷第17、18期，1920年。
- ⑪ 此处所述史实，均据《国学丛刊》第2卷第4期所载之《本刊两卷总目并叙旨》。
- ⑫⑬ 《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载《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 ⑭ 载《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 ⑮ 载《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3月。
- ⑯ 唐圭璋《回忆吴先生》，载《雨花》1957年5月号。
- ⑰ 陈钟凡《自传》，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 ⑱ 载《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
- ⑲ 均见《国学丛刊》，第1卷第3、4期，1923年10、12月。
- ⑳ 载《学衡》第12期，1922年12月。
- ㉑ 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月。
- ㉒ 《再复孙益庵书》，载《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2月。

[高恒文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编 300093]